

资本逻辑批判与生命逻辑建构

——乔尔·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生命政治意蕴

于天宇，王帅帅

摘要：人的生命权利伴随着现代性的发展逐渐被凸显，而作为现代性发展的时代产物，生命政治学表现出对人作为现代主体的自然生命权利的价值审思。在此意义上，科威尔立足于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将人置于整个生态系统的集合中，其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无论对生态危机的揭示，还是对作为危机根源的资本逻辑的批判，都表现出对人的生命权利的政治关怀，具有丰富的生命政治意蕴。科威尔不仅从理论维度揭露了资本与危机对人的生命世界的渗入以及“资本力场”对人的生命权利的异化，而且从实践维度提出了资本主义视域下人的生命政治回归的基本构想，即通向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以实现对人的生命权利的本质占有。因此，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以资本逻辑批判与生命逻辑建构为主题，蕴含着以批判“资本力场”对人的生命权利异化为核心，以克服生命权利异化从而实现人的生命解放为应然旨归的生命政治逻辑。

关键词：乔尔·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生命政治；人的生命解放

中图分类号：A-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24)01-0001-12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231206.001

生命政治批判作为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新维度，充分揭示了资本以一种隐秘性权力实现了对人的生命世界的控制。生命政治学成为分析现代社会的新的理论范式，其主要代表人物，如福柯、阿甘本通过阐释“生命、生命权力、规训、人口”等核心概念揭露了现代主体的生命境况。掌握生命权力的资产阶级政治国家将现代主体置于国家运行的轨道中，主体生命被无情卷入国家的控制之下。这不仅意味着生命权力对生命个体的规训，使之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更意味着个体生命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利保障，成为一种可以随意被处置的“赤裸生命”。因此，生命政治学意义上的生命权力作为一种“死”的权力，实现了对“活”的生命权利的规训和管控。如阿甘本所述，生命政治“最初就已镶嵌在人类共同体之结构当中”^{[1](P22)}，而资本权力装置以其内在运行机理使得人的生命世界变得畸形，作为人最基本的生命权利即劳动权利被“资本力场”^①无情剥夺。在此背景下，科威尔虽然基于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强调自然生态系统的主体地位，但是其思想中同样蕴含着对个体生命的关照，具有丰富的生命政治意蕴。从生命政治的理论维度看，无论是科威尔对人自身生态危机的论述，还是对劳动权利在“资本力场”下变为异己的存在这一现实问题的揭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罗萨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23CKS034）；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研培育项目“新发展阶段实现共同富裕的哲学基础研究”（JDMY2021209）

作者简介：于天宇，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410978314@qq.com（吉林 长春 130000）；王帅帅，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① “资本力场”是科威尔对资本的一个比喻性说法，将资本比喻为力场意指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一种隐秘性权力无处不在，并以自身特有的运动规律控制着社会中的人和一切事物。

露，都可以窥见其理论对现代主体生命的价值关怀，即关涉一种“资本权力与生命权利”的关系。资本逻辑批判与生命逻辑建构成为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两重面向。资本逻辑，从广义上讲，包含增殖逻辑、扩张逻辑以及自行消亡逻辑等，但其实质是资本内在的矛盾运动规律。科威尔从马克思主义的界域出发，认为资本逻辑的本质是一种“生产关系”，其作为“普照的光”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和物实行着绝对统治。而人的生命逻辑，即作为人生命本质的自由活动或劳动却被资本逻辑所裹挟，人生命自由自觉的特性被资本逻辑所遮蔽。在此意义上，科威尔从生态社会主义视域出发，不仅以危机为切入点，对资本逻辑内在的反生态性进行了深刻揭露，而且对资本逻辑统摄下人的生命权利异化进行了彻底批判。相应地，科威尔将对生命逻辑的建构寄托于其构想的未来社会，即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将最终消解人的生命异化形式，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本质将得到充分彰显。科威尔指出，反抗资本的生态社会主义“是为了生命本身，它要拓展维持生命所需的空间”^[2]。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在批判资本逻辑的同时，实现了对人的生命逻辑的建构。国内外学界虽然对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原则与实践构想等方面进行了生态学意义上的多维度阐释，但是缺乏从主体的生命价值视角出发对其作出解读。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中“双重危机论”与“资本力场论”的剖析，理解其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构想，厘清其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现代主体维度与内嵌的生命政治逻辑。

一、“双重危机论”：资本对人的生命世界渗入

科威尔认为，人自身身体与人类社会组成了人类生态系统，并与自然生态系统构成了人的整个生命世界^{[3](P46-51)}。基于此独特的生态视野，科威尔从自然和社会的双重维度揭露了自然生态危机和社会崩溃危机。在他看来，资本追求无止境增殖与最大化利润的本性刺激人本身的需要和欲望，使人陷入对自然资源无尽索取的牢笼中。资本“不增长就灭亡”的运行机理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的良序运转并造成危机，而由于人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自然生态危机必然造成人自身生态系统的瓦解，即一方面，人自身生命的存在受到巨大威胁，最终使生命再生产发生停滞，另一方面，人类社会也将受到自然生态危机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发生崩溃危机，最终导致生命共同体破裂。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态系统二者同时作为人的生命世界永存的物质基础与现实载体，资本逻辑对二者的破坏与其导致的双重危机意味着资本已然渗入人的整个生命世界。资本对人的生命世界的渗入不仅表现为资本对人的自然物质世界的破坏，而且表现为资本渗入人类社会这一生命共同体中并最终使其瓦解。在此意义上，科威尔认为“人们应当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审视这场生态危机”^[4]。双重危机论不仅是科威尔从生态维度对作为危机根源的资本逻辑的批判，而且也是从现代主体生命世界的角度，对资本威胁人的生命存在的深刻揭露。

（一）自然生态危机：生命再生产的停滞

科威尔在《自然的敌人》中用大量的笔墨剖析了资本的逐利性对自然生态造成的巨大破坏，并揭露了其深层根源。他继承了奥康纳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二重矛盾的理论，论述了资本与自然资源（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对自然的破坏性，认为自然生态危机是在资本无限扩张的本性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的矛盾中爆发的。同时，科威尔进一步将其论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交换逻辑”，以此阐明了自然生态危机爆发的根源。所谓“交换逻辑”，科威尔认为作为交换一方的资本，从自然界中交换自身增殖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不断索取自然资源以满足自身的再生产。同时，资本又反过来投入精力和成本，修复和改善其造成的生态危机问题，使得作为交换另一方的自然界

也能从人类生产生活中得到补偿。但是资本的增殖本性造成了这一交换逻辑本身的不合理性,它贪婪的欲望导致消耗自然资源的速度远远超过自然本身的自我恢复能力与资本对其的技术修复效力,使得自然长期无法得到有效补偿。在此意义上,作为交换逻辑的结果只能是不断产生以资本积累为主要内容的交换值。由此,科威尔认为资本出于逐利本性,总会不断超越自然的界限追求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3](P36-37)}。交换逻辑表面上作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基本逻辑,但是其实质是资本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具有不稳定性的根源,正是交换逻辑导致了自然生态危机的产生。由于交换逻辑使得资本增殖与自然可持续代谢长期处于相悖状态,科威尔指出,“资本不能修复生态危机是因为其本质就是制造这种危机”^{[3](P71)}。因此,交换逻辑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会导致自然生态危机的不断恶化,从而破坏现代主体生命再生产的物质场域,威胁现代主体的生命存在本身,最终使生命再生产停滞而导致人自身的生产危机。

关于现代主体生命的生产,马克思认为“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5](P532)}。科威尔继承了马克思从双重维度考察人的生命生产的思维方式。在自然关系层面,科威尔认为人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自然灾害必然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使人生命的生产无法得到保障。同时,社会关系的生产与人自身生命生产的状况直接相关,生命无法正常生产破坏了社会关系生产的物质实体。在此意义上,科威尔认为人类正经历着生态的危机,“在这个危机中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自我,以及整个外部自然界正在经历严重的搅动”^{[3](P15)}。总之,自然生态系统由于人的自然本性成为人的生命再生产的物质基础,是人的生命世界的物质组成部分,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的生命存在及其活动,即人的整个生命世界必须建立在社会生产活动对自然界改造的基础上。而现实的社会生产活动受资本逻辑的驱使,以一种反自然的生产模式破坏着生态系统的平衡。因此,科威尔认为资本逻辑是自然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危机的出现不仅意味着人的生命再生产发生停滞,而且表明资本通过破坏人的自然物质世界而渗入人的整个生命世界。在此意义上,科威尔对人的生存危机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科威尔以危机作为其理论的切入点,从人的存在角度审视自然生态危机,指明了生态危机一定程度上就是人的生产危机。

(二) 社会崩溃危机:生命共同体的破裂

科威尔认为,“社会和自然不是像台球一样的独立的交相碰撞的个体”^{[3](P14)},二者不可分离,紧密相关。人既是自然存在物,也是社会存在物,自然生态是人类生产生活的自然基础,而由资本逻辑导致的自然生态危机从根本上使人类生产生活的根基被动摇。在此意义上,科威尔认为社会崩溃危机以自然生态危机的发生为前提,如其所述,“生态危机与社会崩溃性危机是密切关联的,应被视为同一结构力量的不同表现”^[6],自然生态危机的不断恶化必然导致社会崩溃危机。科威尔认为,社会崩溃危机是指通过战争或一些暴力反叛活动造成的危机等,而这种行为的原动力在于解决自然生态危机,即资本通过暴力手段实现对自然资源的进一步掠夺以维持帝国主义的统治。在科威尔看来,社会崩溃危机对生态危机造成了反噬,战争及恐怖活动这种生态危机的解决方式不仅破坏了自然生态,而且对自然资源造成了无谓浪费。资本无限制地追求增殖使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调节,导致危机得不到根本解决,资本主义唯一的选择就是“诉诸残酷的武力,从而加剧异化,并播下进一步恐怖主义的种子”^[6],最终陷入无休止的暴力反叛活动的泥沼中。在此意义上,科威尔以衣蛾啃食“羊毛衫”为隐喻,形象地揭露了国家或社会共同体由于不断受到迫害而最终分崩离析的过程。科威尔对社会崩溃危机的预示同样是从现代主体存在的维度对生命主体生存境遇的揭露,这一危机的根源仍在于资本逻辑,危机的不断加剧将逐步破坏人类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最终导致人的

生命世界的现实载体，即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虚假的共同体土崩瓦解。换言之，社会共同体不仅作为人的生命世界得以展开的现实场域，人的全部生命活动也在其中得以进行，而且作为人的生命政治的最初表现形式，其为现代主体的生存及生命权利的实现提供根本的政治保障。然而，社会崩溃危机的不断恶化将意味着资本逻辑导致现代主体存在与生活的共同体的破裂，现代政治国家的运行无法得到保障，处于国家轨道中的社会个体权利的实现更是成为无稽之谈。因此，社会崩溃危机表明，科威尔从共同体的角度审视危机，共同体危机不仅导致现代主体生命无序化状态以及生命政治化过程的终止，而且表明资本已然实现了对人的生命世界渗入。

科威尔的双重危机论揭示了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揭露了资本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力量对自然界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破坏，对整个现代主体生命世界的威胁。由此可见，不同于奥康纳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科威尔从自然生态与社会共同体层面论述危机。关于自然生态危机，二者都继承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态批判维度，分别以“交换逻辑”和“生产条件”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性。不同于奥康纳经济危机论，科威尔将对危机的论述上升至社会共同体维度，经济危机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侧重于经济层面；共同体危机虽然表现为一系列反叛活动，但是其受制于资本逻辑驱使的各种经济因素，其外延不仅包含奥康纳意义上的经济危机，而且意味着人的生命存在本身受到威胁，侧重从生命共同体的维度揭露人的生存境遇。“双重危机论”意味着科威尔从人的存在主义的角度审视危机，其生态社会主义理论通过对双重危机的批判，实质上揭露了资本对人的生命世界的渗入。这一方面体现为资本的“交换逻辑”造成的自然生态危机使生命的自然性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人的生命再生产所依赖的物质实体被破坏，人的生命本质无法在对自然界改造的过程中得到实现。另一方面，社会共同体在资本逻辑运作过程中也伴随着战争等暴力活动出现了崩溃的可能，使生命个体彻底沦为“赤裸生命”。因此，资本作为双重危机爆发的根源破坏了人的生命世界得以展现的物质基础与现实载体，最终似幽灵般充斥着人的整个生命世界并剥夺了现代主体基本的生命权利。现存政治较前资本主义制度本应该保障现代个体的生命权利，而资本逻辑对生命主体的规训使得个体生命在国家轨道中无法正常运转，现代主体的生命权利在生命国家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受到应有的保障，而是被资本所侵蚀，最终表现为人的生命权利异化。

二、“资本力场论”：人的生命权利异化

科威尔继承了马克思的资本批判逻辑，并将资本比喻为一个“巨大的力场”，认为资本力场“这个无处不在的、非常有力量、给人以很大误解的事物驾驭着我们的社会”^{[3](P33)}。在其看来，“资本力场”作为对资本的隐喻，其本质是资本逻辑，不仅表现为自然属性下的物的逻辑，即资本增殖逻辑，而且表现为社会属性下的关系逻辑，即资本的本质是以物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科威尔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和物受到资本逻辑的绝对支配。他借“资本力场”的隐喻阐释了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同时着重强调这个隐喻对工人的劳动来说同样是事实^{[3](P33)}。作为实现人的生命本质最根本的生命权利，劳动权利在“资本力场”的辐射下以劳动力的形式被资本所吮吸，人的劳动由“真正的生活方式”变成劳动者的谋生手段，最终沦为资本的附庸，服务于资本增殖。因此，科威尔认为“资本力场”是人的生命权利异化的根源。他基于对“资本力场”的批判，从人的生命权利实现的维度出发，揭示了现代生命主体的存在状况。其理论的主体维度直接指向了生命政治学的核心问题，即强调人的生命权利在生命国家化的过程中何以得到实现以及个体生命的现存状

况问题。生命权利异化及其批判构成了其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中生命政治意蕴的核心,集中表现为对劳动力商品的批判、自然性别分歧的批判以及资本的全球化控制的批判。

(一) 交换价值逻辑与人的自然性异化

资本对人的生命权利异化首先表现为对现代主体劳动权利的异化,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交换价值逻辑。科威尔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重视商品的交换价值而忽视使用价值的本性,批判了“资本力场”的反生态性。他强调,资本主义“交换过程是交换价值超过使用价值的优势的表现,也包含着双重退化”^{[3](P35)},它一方面将自然界商品化,另一方面将人类身体商品化,这共同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造成了生态危机。因此,科威尔批判资本反生态性的同时蕴含着对劳动力商品化的批判,劳动力成为商品是理解人的劳动权利异化的根本前提。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自由自觉的劳动归结为人的内在本质,认为其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标志,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劳动变成了劳动者自身生命延续的手段,人必须出卖其劳动力以获取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科威尔也指出,“资本源于劳动力的开发……其核心是将人类变革的力量转变成劳动力,从而能够在市场上销售”^{[3](P45)}。资本场域中的交换价值逻辑使得劳动力从人的肉体中脱离而变成劳动力商品以服务于资本增殖的目的。由于劳动力的商品化,劳动作为人最基本的生命权利,形式上被劳动者占有,实质上则在资本交换价值逻辑的主导下,变成一种脱离劳动者的异己的存在形式与劳动者相对立。现代主体的生命由此呈现出异化状态,即“人的生命属性或本质异化为外在的权力对自身的统治”^[7],而这一外在的权力就是资本权力。生命政治学始终关注人的自然性问题,将人的生命看作自然生命,认为生命与权利的关系具有天然性,在自然生命的基础上,人直接获得同等的社会权利。劳动权利作为人的生命权利的核心,既是人的生命得以延续的保障,也是实现人的内在本质的根本途径。作为人的最本真的权利,由于受到“资本力场”的主导而被剥夺,现代个体最终沦为“非人”,沦为了“赤裸”的自然生命。

科威尔对交换价值逻辑主导的劳动力商品进行彻底批判,以此强调作为现代主体的自然性权利之劳动权利在生命政治化过程中不仅没有真正实现,反而受“资本力场”的宰制变为了异化形式,这与阿甘本意义上的“赤裸生命”具有同样的意蕴。二者的根本不同则表现为前者批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资本力场”,后者则批判至高权力,但二者具有共同的价值旨归,即实现生命个体的真正解放。科威尔继承了马克思资本批判的生命政治学之维的基本前提,即对劳动力商品的批判。马克思通过批判劳动力商品,不仅揭示了资本对劳动力所有者本身的生命基质的剥夺,而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事实,即“不顾工人死活地使资本价值增殖,从而创造剩余价值”^{[8](P534)}。因此,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批判“资本力场”同样内嵌着对人的劳动权利异化的批判。

(二) 劳动分工逻辑与女性权利异化

“资本力场”对人的生命权利异化同时表现在性别剥削上,科威尔认为“类似的影响也存在于性别层面上”^{[3](P49)}。随着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确立,只有一小部分女性获得了自主的权利和机遇,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女性来说,情况变得更加恶化。科威尔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提出了著名的“自然的性别分歧”的论断,认为男性作为人类的代表,女性作为自然的代表,人对自然的统治关系就如同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关系。控制关系根源于劳动分工,同时科威尔强调这种控制力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了极致,认为在原始社会,男性与女性分别负责打猎和采集,同时伴随着生殖工作,“最初的分工使得男性成为生命的接受者,女性成为给予者”^{[3](P105)}。马克思在《德意

志意识形态》中也对最初的性别分工进行了阐明，即“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地’形成的分工”^{[5](P534)}。但是随着生产力发展与私有制的出现，男性在社会中逐渐占据统治地位，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私有制作为这一社会的典型特质导致人的不平等化更加严重。科威尔认为，男性统治女性在这一社会中逐渐变得彻底，女性生存状况的恶化在血汗工厂劳动的女性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劳动分工使得男性统治女性成为可能，并随着分工的不断发展，这一控制关系也将不断深化。

科威尔指出，“自然层面上的性别自然而然被启用，它对性别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分工明确，只要以资本主义形式出现，那么生态危机就来了”^{[3](P106)}。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统治关系，另一方面，男性对女性也进行着性别统治。社会中渗入了一种异化的力量，使整个生态系统造成了分裂，既涉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危机，也包括人类生态系统的异化。男性统治实质是否认生命的特性。这一控制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表现为对女性身体与劳动力的掌控，资本增殖逻辑使女性劳动力沦为廉价雇佣劳动，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本性甚至剥夺了女性劳动的权利。当女性面临着家庭和社会的束缚时，离开家庭去工厂工作可以看作是寻求解放。当她们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贩卖自己的劳动力进入工厂后，为了能够长期进行工作以维持基本生活需要，又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以此抓住实现她们生命价值的机会。其次，掌控又表现为对女性的意识形态控制。科威尔继承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作为一种将生态学与女性主义相结合的激进绿色思潮，它认为女性与自然具有天然的关系，女性解放与自然解放密不可分。正如资本统治自然的反生态性一样，资产阶级统治得以确立必然伴随着控制女性的意识形态的确立。基于此，生态女性主义批判了像幽灵一样游荡在整个现代社会中的反自然意识与父权制统治意识，揭示了自然解放与女性解放的相互关系。科威尔从马克思资本批判逻辑的视域出发，通过对“资本力场”下导致的性别剥削的批判，揭露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人的生命权利被蔑视的现实状况。尤其是对女性这一特定群体来说，在实现了政治解放后，由于生命权利被资本所剥夺，女性生命个体仍然要过一种异化的生活。

（三）资本扩张逻辑与生命异化全球性

资本对人的生命权利的异化进一步表现为现代主体异化的全球性维度，其根源于资本逻辑在全球范围内的渗透与扩张。基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科威尔对危机的论述始终建立在人类社会的高度上，整个人类社会的危机进一步表征了生命异化的全球性。科威尔认为，人类愚蠢地发动了这场生态危机，同时连累了无数其他的生物，“我们将在自己的舞台上狠狠地摔一跤”^{[3](P15)}。无论是全球变暖等自然生态问题，还是无休止的恐怖主义等社会生态问题，都能体现出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的全球性。值得关注的是，科威尔虽然基于生态中心价值观从自然生态的角度论述危机，但是他将这一全球性危机的影响指向了人类自身的生命生存状态。

科威尔认为，资本扩张逻辑加速了全球化进程，同时加速了生命异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如其所述，“全球化的概念在表达这样的—个事实：资本的扩张、殖民、渗透发生在全球范围内”^{[9](P72)}。关于印度博帕尔事故，他犀利地指出，“为了降低花费，联合碳化物公司把博帕尔置于危险的境地”^{[3](P31)}，这一事故是为了盈利而降低成本的意外事故。公司表面上为了开展“绿色革命”，实质是以资本逻辑为主导、以获利为目标所进行的生产活动。随着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确立起统治地位，资本对全球自然资源也进行了永无休止的掠夺，最终导致全球生态危机的爆发。科威尔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用自己的方式摧毁生态系统的平衡，这一方式是非线性的、致命的、混乱的^[10]。如果资本扩张逻辑不能从根本上被瓦解，我们终将受到生态危机的报复从而失去生存的机会，全球生态危机的爆发必然威胁整个人类世界。马克思指出，“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

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5](P541)}。他充分阐释了各民族间的普遍交往受资本扩张逻辑驱使而不断扩大并逐渐形成世界历史，以此证明了整个人类生存境遇的变化。在此意义上，科威尔继承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认为资本逻辑作为“占据主导和霸权地位的经济制度”^[4]促使其“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并侵入人类生活”^[4]。这表明其不仅以危机为切入点揭露现代主体的生命状况，而且从人类世界的角度对人的生命境遇进行了阐明。科威尔将对现代主体生命权利的关照上升到整个人类世界的高度，强调资本权力凌驾于人的生命之上。现代主体的生命安全与自由无法得到保障，最终将沦为处于例外状态中的“赤裸生命”。

科威尔基于生态社会主义的“资本力场论”，批判了资本逻辑下人的劳动权利的异化、资本对女性的性别剥削以及资本扩张性对整个人类生命世界的威胁，论述了其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生命政治意蕴的核心，即资本对人的生命权利异化及其批判。他认为，不仅人的生命权利在“资本力场”的辐射下变成异己的存在形式，而且以资本增殖为根本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消解着人的生命基质。在此意义上，科威尔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命政治思想，但是其“资本力场论”沿着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逻辑理路，阐释了生命本质、生命境遇以及生命权利等一系列与生命政治相关的基础问题。同时，科威尔通过批判“资本力场论”，既在理论维度对人的生命权利异化进行了深层剖析，又从现实路径出发构想了通向生态社会主义的道路，进一步论证了人的生命权利异化与生命基质的消解将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得到“真正回复”，从而建构了其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以无产阶级生命解放为问题意识的生命政治之实践逻辑。

三、生态社会主义：人的生命政治回归

由此看来，科威尔继承了马克思在资本批判中伸张人的根本价值立场，其对“资本力场”的揭露内蕴着对生命本身的关照。科威尔认为，无止境增殖与追求最大化利润的资本逻辑不仅造成了威胁人生命生存的双重危机，而且其导致的劳动权利异化彻底掩盖了人生命自由自觉的本性。在此意义上，科威尔认为资本逻辑不只是一个经济体系，更关联着人类生存发展，人类“逐渐由自然的产物变成了资本的傀儡”^{[3](P4)}。危机的出现意味着资本作为一种物的逻辑无限增殖剥夺了人类生存发展的空间，劳动权利的异化意味着资本作为一种关系逻辑如幽灵般统摄着劳动者并使其臣服于自身。如其所述，资本逻辑“对自然的威胁同时也是对生命的恐吓”^[2]，资本本质上是“否定生命”的逻辑，生命也随之变为附属于资本增殖的奴隶，资本逻辑与生命逻辑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始终无法实现同一。正因如此，科威尔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将代替行将就木的资本主义，通过祛除资本逻辑以建构人的生命逻辑。生态社会主义社会通过自由联合劳动力的形式开展，实现以生态为中心的目标，即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就是生产模式以生态为中心的社会。生态社会主义不仅作为科威尔修复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自然创伤所建构的新型生产方式，同时这一生产方式的核心原则与现代主体的生存方式具有结构性关联。这一生产模式旨在跳脱“资本力场”，是在自然的解放与人的生命解放的基础上真正实现生产者的自由联合，从根本上确保现代主体的生命活动能够在国家的轨道上正常运转，使人的生命权利克服“资本力场”下的异化状态，从而使现代主体真正实现生命政治化。

（一）生态中心生产：生命世界的保障

不同于其他生态社会主义者，科威尔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坚持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观，重视自然的内在价值。生态社会主义的第一重面向就是以生态为中心进行生产活动，科威尔将

马克思未来社会思想与生态中心立场相结合，对生态中心生产的基本内涵进行了预设。他认为，废除交换价值制度，摒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交换逻辑”，实现人与自然合理意义上的交换是进行生态中心生产的前提和基础。同时，生态中心生产以生产完整的生态系统为原则和目标，能够在充分实现自然内在价值与劳动力使用价值的基础上生产生态化产品，以构建整个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从而尊重所有的生命。在此意义上，科威尔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指导人类生存方式的伦理道德”^[4]，“这一目标不仅适用于我们自身，也适用于整个世界”^[4]。生态中心生产将实现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生态系统的统一，从而保障现代主体存在的整个生命世界。

一方面，生态中心生产在生产中能够保障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科威尔将人类纳入生态体系之中，以生态为中心的生产能够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同时，保障人的生命世界。他指出：“生态社会主义能够通过使用价值的实现和内在价值的合理利用而使得其发展得更好。”^{[3](P192)}所谓内在价值，科威尔认为“自然的价值在于其本身，而不是取决于人类可以如何利用自然”^[4]。自然的内在价值表现为自然的本质，其存在的意义不是制造商品与实现资本增殖，而是在遵循自身内在规律的基础上满足人类真实有效的生活需求。然而，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追求无限的交换价值导致了自然与人类身体的商品化，由此造成的生态危机违背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使得人的生命世界亦变成了与人的本质力量相异化的存在形式。据此，科威尔认为“交换价值在精神层面的对立面就是内在价值的逻辑”^[4]，重视自然的内在价值便意味着与资本追求交换价值的逻辑相对抗。在此意义上，以生态为中心的生产改变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节制的以利润为中心的生产模式。这一生产原则不仅摆脱了交换价值逻辑的束缚，能够“将自然更加‘有效转化’”^{[3](P175)}以充分实现自然的使用价值，而且充分彰显了自然的内在价值以更好地满足人类未来的生活需求。科威尔认为生态中心生产“以生态系统建构而不是以商品生产为中心”^[4]，生产必须以生态为中心代替以资本为中心，才能合理利用自然内在价值而充分保证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在此基础上保障人的整个生命世界。

另一方面，生态中心生产从深层次上保障了人类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科威尔认为以重视使用价值和内在价值为主导的生态中心生产既指向了自然生态系统的统一，也指向了人类生态系统的统一。人的生命世界不仅得到了保障，而且人在生产活动中也展现出了满足与自由的生存状态。科威尔认为生态化的生产过程与其产品具有一致性，以生态为中心进行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与娱乐，而满足与娱乐应同时体现在生产过程及其产品中，劳动者的生产过程是愉悦和惬意的^{[3](P192)}。相比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快乐体现在业余爱好中，在生态中心生产组成的社会中，“品味一道佳肴和穿一件精致的衣裳是惬意的，烹调和设计与裁剪的过程也乐趣无穷”^{[3](P192)}，这些快乐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建构过程中。以生态为中心的生产打碎了资本逻辑的枷锁，劳动者能够自由自觉地进行生产活动而不受资本逻辑的支配，劳动者能够充分实现自身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而不是仅仅在资本框架内沦为劳动之力。在此意义上，科威尔指出，“劳动力能够被自由选择和发展”^{[3](P193)}，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者的内在价值相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不被承认”而得到“承认”。如科威尔所述，“对产品的承认也应该推及对劳动者生产过程的承认，这是建立完整生态体系的重要条件”^{[3](P193)}。因此，生态中心生产的内容就是建立完整的生态系统，这不仅面向自然界，而且指向人类自身。科威尔认为生态中心生产保证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使人类生态系统摆脱了资本统治下的“畸形”化而实现了重构。

综上所述，科威尔认为资本作为一种生产组织方式使完整生态体系的互联性被切断，相反，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模式要将生态的思维贯穿生产过程的始终，这意味着人要承认其是自然的一部分，要将自身融入自然之中，整个自然生态系统就是人的全部生命世界^{[3](P14)}。生态中心生产作为

生态社会主义的第一重面向，其将祛除资本逻辑对自然与人之生命的宰制，主张重视使用价值与实现自然内在价值，从而保障人之生命本质实现的自然性。正是在此意义上，科威尔认为以生态为中心的“生产活动是通过人类本质表现的自然形式”^{[3](P192)}。生态中心生产使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生态系统实现同一，不仅促成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在物质维度保证了人类自由自觉之劳动特性的展现，而且从生命存在的角度对人所生存的现实世界进行了重建，为人的生命权利由“资本力场”下的异化状态到生态社会主义的真正复归提供了基本的物质场域。

（二）自由联合生产：生命权利的实现

马克思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P53)}。基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科威尔提出了“生产者的自由联合”。他认为，以生态为中心作为生产的原则和目标，自由联合生产就表征为生产的具体方式，生态中心生产必然意味着生产要以自由联合劳动力的形式开展。所谓自由联合生产，科威尔认为与生态中心生产的原则与目标相一致，其前提必须否定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有效结合的基础上生产完整的生态系统。自由联合生产以生态为中心，其生产内容不是商品，而是整个生态系统。在此基础上，作为生产现实表现的劳动将摆脱资本主义生产下的异化状态而真正彰显人之本质。科威尔对“自由联合生产”的具体内涵作出了如下规定，即“自由联合生产”首先必须是“自由的”，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每个人都是自决的，都能自主决定自身的生存方式，这就使“社会必须要确定所有人都能够获得生产方式”^{[3](P223)}。所以生产者自由联合必须打破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交换价值逻辑，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生产者之自由性。其次，“自由联合生产”还是一个自由的“联合”，科威尔认为生命是一个集合体，不存在单个人的脱离社会集体的生产，每个人通过共同的生产活动得以聚集。最后，“自由联合生产”还将是生产者的联合，这意味着其所进行的生产活动能够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考虑进来，用一种自然的意识去指导生产活动，同时能够从整个人类世界的角度进行生产，而不是以交换价值逻辑为主导的生产。

正是基于自由联合生产的内在规定性，科威尔认为人的生命权利将在“自由联合生产”的方式下实现由异化状态向人的生命本质的真正复归。从人的自然性异化的角度看，由于自由联合生产克服了“资本力场”下的交换价值逻辑，人的劳动力由受资本驾驭转变为被劳动者真正占有。人的最本质的生命权利将不再是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而得到真正实现，如科威尔所述，“生态社会主义中的自由联合劳动力，是愉悦的、满足的、不压抑的”^{[3](P201)}。劳动过程中的人的肉体摆脱了折磨，精神避免了摧残，其劳动能够真正实现自己的本质。从女性权利异化的角度看，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使“资本力场”驱使下人的贪婪的性格和无尽的欲望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逐渐消亡。无论是人与自然的矛盾，还是男性对女性的压迫都将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得到合理解决，即自由联合生产的生产方式将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真正和解。关于人的生命异化的全球性，科威尔认为“真正的生态社会主义要求消除整个国际分工，包括无产阶级工人，或者雇佣劳动力”^{[3](P211)}。资本对劳动力的统治是资本得以成功的基础，而资本扩张逻辑实现了对整个人类世界统治的同时造成了所有现代主体生命权利的异化。在自由联合生产下，由于消灭了国际分工，全球范围内尤其是殖民国家受到资本癌变的影响将从根本上得到消除。由此，科威尔强调“生态社会主义将会是国际的和世界的，否则其就一无是处”^[6]。因此，人的生命权利在自由联合的生产模式下将得到真正实现，科威尔认为“人权的整个理念都是由自由联合劳动力产生的，也是我们真实存在的终极体现”^{[3](P202)}。“自由联合生产”作为生态社会主义的第二重面向将从根本上改变生产资料所有权性质，能够打破以资本逻辑主导的生产模式，将“尊重所有生命体的权利”^{[3](P202)}。

科威尔认为，生态中心生产和自由联合劳动力这两股主流相互生成，二者将引领我们进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基于马克思将人的本质的复归诉诸现实的革命，科威尔认为要使生态中心生产与自由联合生产得以实现，必须通过革命来战胜资本以走向完全的共同体，从而诠释生态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完全的共同体作为一种“真正的共同体”，将在构建完整的生态系统的同时，保障所有生命个体。科威尔指出，“生态社会主义最最重要的是为了生命，致力于生命的延续和繁荣。这就是生态社会主义存在性的核心意义”^[2]，而作为现代主体的劳动者的生命自然地内嵌于其生态社会主义的生命视域中。科威尔认为解放劳动力是战胜资本的前提，人类会在“解放自身的过程中自发地解放他人和自然界本身”^[10]，最终将以生态中心生产的原则，以生产者自由联合的方式通往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由此看来，科威尔所构想的完全的共同体虽然追求生态中心主义的目标，但是它仍然实现着现代主体的生命权利，共同体内部的每个个体不是处于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利保障而沦为随意被处置的“赤裸生命”状态，相反，这一完全的共同体将使得现代主体挣脱资本的锁链以获得真正救赎，回归自由自觉的本质以实现生命解放。正是在此意义上，科威尔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关于存在的合理性选择，因为其“有助于我们生存下来并生活得更加幸福”^[2]。总之，通过阐述生态中心生产的目标与自由联合生产的方式，科威尔构想了实现生态社会主义以保障现代主体的生命本身的实践路径。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理论通过批判资本逻辑以建构人的生命逻辑，不仅做到了对现代主体生命异化“病症”的揭露与“病理”的剖析，而且从生态视角出发提出了克服生命异化以真正实现人的生命政治化的良方。

四、结 语

综上所述，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蕴含着深刻的生命政治逻辑，即通过阐释资本及危机对人的生命世界的渗入、“资本力场”对人的生命权利的异化、生态社会主义使人的生命政治真正回归，其旨在论证现代主体的生命权利何以真正得到实现。与此同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看，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不仅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且在《资本论》中以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裂缝”隐喻阐明了资本逻辑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12](P579)}。同时，马克思将问题聚焦人本身的境遇，其认为“裂缝”的出现使得“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12](P579)}遭到了严重破坏，并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将真正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和解。在此意义上，科威尔继承了马克思从生态问题中透视人之问题的理论视角，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建构了其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从生命政治学理论视域看，在资本逻辑的宰制下，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命政治显现出畸形的发展过程，政治权力对人的规训使人被置于现代国家运行的轨道中并呈现出异化状态。生命政治学作为批判现代社会的新的理论范式，其主要代表人物福柯基于权力分析视角，将生命政治定义为权力的“生命治理术”。现代政治国家通过生命治理术实现着对个体生命与整体人口的规训与调节，使生命符合资本主义的运行，以此揭露了新自由主义对生命的隐形奴役。哈特、奈格里基本承袭了福柯理论视角，承认资本权力对人的掌控，利用现代主体的非物质生产劳动赋予生命政治以积极的解放意义，揭示了主体受到权力宰制的同时能够生成新的生命解放因素。在此意义上，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同样关涉人这一现代主体的生存状态，其对“资本力场”的批判，本质上是对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国家的批判。资本对人的生命世界的渗透和破坏无疑对人的生命权利的实现造成了威胁，生命权利的异化及其批判构成了其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中生命政治意蕴的核心。因此，从科威尔意义上讲，生命政治关涉一种“资

本权力与生命权利”的关系。然而,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对生命政治意蕴的阐发与主流的生命政治学流派有些许不同之处。其一,理论切入点不同。福柯从权力与生命技术的视角出发,阐释了由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构成的生命权力对现代主体的惩戒与规训,揭示了新自由主义治理术下人的生命境遇。而科威尔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以生态危机为切入点揭露资本逻辑对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命世界渗入以及对生命权利的异化,同样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大量“赤裸生命”之“非人”的存在样态。其二,破解生命困境的解放路径不同。福柯基于独特的权力技术视角,主张以自我技术反抗外在的生命权力技术以跳脱现代性困境。哈特、奈格里在阐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继承了马克思的历史分析法,认为占据主导地位的非物质生产劳动将产生反抗资本主义权力的新型主体,即由工人组成的、作为新的阶级力量的“诸众”正在生成,将伴随着主体意识的觉醒而成为现代社会的“掘墓人”。不同于福柯、哈特与奈格里,科威尔将生态中心主义立场与马克思革命思想相结合,在批判“资本力场”的基础上建构起一种革命型生态社会主义的解放范式,主张利用生态中心生产与自由联合生产的生产模式实现人的生命权利的复归。然而,科威尔虽然继承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资本批判逻辑,将现代主体生命权利异化的根源归结为“资本力场”,但是其坚持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使得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构想具有超历史的形而上学性。在此意义上,其所论证的人的生命解放路径也具有一定的乌托邦性,最终将“陷入或悲观或浪漫的境地,找不到真正的解放出路”^[13]。不可否认的是,尽管科威尔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一定程度上难以付诸实践,但是其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思想从根本上揭露了人的生命世界由于受到“资本癌病”的影响脱离了原初的生存状态,同时指向了人的生命权利何以实现等问题。因此,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虽然以生态维度展开论述,但是其对现代主体的生命境况、生命权利以及生命价值本身的关照表现出内嵌于其中的深刻的生命逻辑。同时,科威尔对人的生命政治进行批判的生态切入点为当代生命政治学流派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域,启示我们要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人的生命的反思与批判始终不能脱离生命本身所处的生态环境。无论是科威尔对人的生命逻辑的建构,还是生命政治学批判的理论框架,都只有遵循马克思所构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原则,二者才能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 [1] [意]吉奥乔·阿甘本. 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M]. 吴冠军,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 [2] [美]乔尔·科威尔. 生态社会主义、全球公正与气候变化[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5).
- [3] [美]乔尔·科威尔. 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毁灭[M]. 杨燕飞,冯春涌,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 [4] [美]乔尔·科威尔. 生态社会主义:一种人文现象[J]. 国外理论动态,2015(9).
-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Joel, K., M. Lowy. An ecosocialist manifesto[J].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2002(1).
- [7] 贺来. 从生命政治学回到“工业病理学”——对资本主义“生物现代性”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J]. 社会科学研究, 2023(2).
-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9] Joel, K. *The Enemy of Nature: The End of Capitalism or the End of World* [M]. London, New York: Zed Books, 2007.
- [10] [美]乔尔·科威尔. 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的视野[J]. 国外理论动态, 2014(10).
- [1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1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13]孙乐强.《资本论》与生命政治问题再探讨[J]. 思想理论战线, 2022(2).

Criticism of Capital Logic and Construction of Life Logic

— Life Political Implication of Joel Kovel's Ecological Socialist Theory

YU Tian-yu, WANG Shuai-shuai

Abstract: The right of human life has gradually been highligh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ty. As a produ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ty, the philosophy of life politics demonstrates a value review of the natural life rights of humans as modern subjects. In this sense, Kovel, based on the values of ecological centrism, places human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entire ecosystem. His theory of ecological socialism demonstrates political concern for human life rights and has rich lif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in both revealing ecological crises and criticizing the logic of capital as the root cause of crises. Kovel not only exposes the infiltration of capital and crisis into the human life world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s well as the alienation of human life rights from the “capital force field”, but also proposes the basic concept of human life political retur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pitalism in practice, which is to lead to an ecological socialist society to achieve the essential possession of human life rights. Therefore, Kovel's theory takes the criticism of capital logic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ife logic as its theoretical theme, containing a life political logic that focuses on criticizing the alienation of human life rights by the “capital force field”, and aims to overcome the alienation of life rights and achieve the liberation of human life.

Key words: Joel Kovel; ecological socialism; life politics; emancipation of human life

(责任编辑 孙 洁)